

9

深夜，机关里斗争会结束他才回到房里，和他同住一间屋的同事老谭已经由红卫兵关在办公楼的会议室里，隔离审查回不来了。他锁上房门，掀开窗帘一角，见院里邻居家灯光全熄了，放下帘子，再仔细查看别漏一点缝隙，这才打开煤炉。旁边放上个水桶，开始烧他那一叠叠的稿子，还有一堆日记和笔记，自他上大学以来大大小小有好几十本。炉膛很小，得几页几页拆开，等焦黑的纸片烧透成为白灰，再铲进水桶里，和成泥，不容一点没烧尽的黑纸屑飘留在外。

有一张他儿时和父母合影的旧照片，从日记本里掉出来。他父亲穿的西装打的领带，母亲一身旗袍。他母亲还在世，倒腾衣箱晒衣服的时候，他见过这件橙黄花朵墨蓝底子的丝绒旗袍。照片上的着色已褪得很淡。父母相依含笑，夹在当中那清瘦的孩子，胳膊细小，睁一双圆眼仿佛在等照相机匣子里要飞出的鸟。他毫不犹豫便塞进炉膛，照片边缘噗的一声燃烧起，父母都卷曲了才想起去取，已经来不及了，便眼见这照片卷起又张开，他父母的影像变成黑白分明的灰烬，中间那精瘦的孩子开始焦黄……

就凭他父母这身衣着，很可能当成是资本家或是洋行的买办，能够销毁的的都烧了，尽可能割断过去的一切，抹掉记忆，就连回忆那时候也成为沉重的负担。

他焚烧那些手稿和日记之前，目睹群红卫兵把个老太婆活活打死，光天化日，在闹市西单那球场边上。午间休息吃中饭的时候，大街上来来往往许多人，他骑车经过。十来个小伙子和几个姑娘，穿的旧军衣，戴的黑字红袖章，十五、六岁的中学生，用军用皮带打一个在地上爬的老女人，颈脖子上吊个钱丝栓的木板子，写的是“反动地主婆”，已经爬不动了，但还在嚎叫。行人都隔开一段距离，静静观看，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。戴大盖帽的民警晃着白手套从马路上经过，仿佛视而不见。其中的一个女孩短发扎成两把小刷子，浅色的眼镜框，更显得眉清目秀，居然也轮起皮带。皮带的铜头打在一丛花白乱麻般的头上，噗的一声，这老女人便双手抱头，滚倒在地上，血从手指缝里流了出来，竟叫不出声了。

“红色恐怖万岁！”红卫兵纠察队骑着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，从长安大街上列队驰过，一路高喊这口号。他也碰到过他们盘查，夜间才十点钟左右。他骑车从钓鱼台国宾馆有武装警卫把守的大门前刚过，前面明晃晃的水银灯柱下信了几辆带斗的摩托车，一排穿军装戴红绸黑字“首都红卫兵联合委员会”袖标的青年拦在路上。

“下来！”

他猛的捏闸，差点从车上跌下来。

“什么出身？”

“职员。”

“干什么的？”

他说出他工作的机关。

“有工作证吗？”

他幸好带着，掏出给他们看。

又有个骑车的年轻人自行车上拦下来了，剃的平头，那时候“狗崽子”自贱的标记。

“这夜里还不老老实实在家待！”

他们放过他了。他刚骑上车，听见背后那剃平头的小伙子吱唔了两句便打得嗷嗷直叫，他却不敢回头再看一眼。

接连几天，从深夜到将近天亮，他面对炉火，眼烤得通红，白天还得强打精神，应付每天都可能出现的危机。等烧完最后一叠笔记本，泥灰搅拌得不露痕迹，再倒上一盘剩菜半碗面条他已筋疲力竭，眼皮都撑不开了，和衣躺在床上不能入睡。他记得家中还有张可能惹是生非的老照片，是他母亲年轻时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抗战救亡剧团穿军装的合影，那军装想必是慰问抗日将士时赏给演员们的，帽上有个国民党标志的帽徽，这照片查抄到的话肯定会出问题，那怕他母亲早已去世。他不知道他父亲是不是把这些照片也处理了，可又不便去信提醒。

销毁了的那堆稿子中有一篇小说，他曾经给一位有名望的老作家看过，本指望推荐，至少得到认可，谁知老人毫不动容，没有一句鼓励后生的话竟然沉下脸，声色俱厉告诫他：“出手的文字，要三思而行！别随便投稿，你还不懂文字的风险。”

他并非立即就懂。那年初夏六月，这文革刚发动，一天傍晚，他去老人那里想打探运动的消息，刚进门，老人便赶快掩上，压低声音盯住他问：“有没有人看见你进来？”

“院子里没人呀，”他说。

老人平时训导青年虽不像那些老干部，开口闭口我们党我们国家如何如何，可好歹也是有一番革命资历的名人，说起话来中气也足，有板有眼，毫不含糊，此时突然蔫了，缩缩瑟瑟声音都压在喉管里：“我已经是黑帮分子，别再到我这里来了。你年轻，别惹上麻烦，你没经过党内斗争——”

老人不容他把问候的话说完，紧张得不行，打开一线门缝，望了望，说：“以后再说，等过了这阵子，以后再说，你不知道延安整风！”

“延安整风怎么的？”他还傻问。

“以后再告诉你，快走吧，快走！”

这前后时间不到一分钟。一分钟前，他还以为这党内斗争远在天边，没想到就到了跟前。

十年之他听说老人从牢里放出来了，他那时也从农村总算回到了北京，去看望这老人家。老头干瘦的只剩下一副皮包的骨头架子，断了条腿，靠在躺椅上，手里抱只长毛的大黑猫，椅子的扶手边搁根拐杖。

“还是猫比人活得好。”

老人咧嘴，似笑非笑，露出还剩下的几颗门牙，一边抚摸那老猫，深陷的眼窝里，圆睁的眼珠也像猫眼发出奇异的光。老人在狱中的遭遇没同他说一句，真到临死前不久，他到医院里去看望时，才对他吐了真话，说一生最大的遗憾，便是不该入这党。

当时，他从老人家门出来，便想到他自己的那些稿子，虽然同党毫不相干，也会给他带来灾难。可那时还没决心烧毁，背了一大书包，藏到他有次得痢疾住医院结识的朋友大鲁的家。大鲁高个子，北京人，中学校教地理的，在追求一个娇小的女子，一份份情书都是找他代笔起草的。等大鲁新婚的妻子发现是他帮助作弊，已生米成了熟饭，他同他们夫妇也就都有一点交情。大鲁同他父母住一起，自家有个四合小院，藏一包东西倒是不难。

八月盛夏，红卫兵兴起，大鲁的妻子突然打电话到他办公室，约他中午在一家喝牛奶卖西式糕点的铺子见面。他以为他们夫妻间又出了什么纠葛，骑车赶到那糕点铺。老招牌已经摘掉，贴上了新标语“为工农兵服务”。铺子里的座位上方墙上，歪歪扭扭墨笔写的一大条口号：“资产阶级臭崽子们滚蛋！”

从中学校发端的红卫兵“破四旧”，开始还像是小儿胡闹，伟大领袖给他们写了封公开信，称赞“造反有理”，青少年的暴力就这么煽动起来了。他横竖不是臭崽子，进去了，牛奶倒是照卖。他还没找座位坐下，大鲁的妻子进来，便拉住他手臂像是他女友，说：“这会儿不饿，你先陪我街上走走，我要买点东西。”

他们出了糕点铺，到了街上，她才小声说，大鲁被学校的红卫兵吓得自己先剃了光头，因为家有房产，不算资本家也是小业主，红卫兵随时可能搜查，叫他把塞在他们家院子煤棚里的那包东西赶快取走。

是林救了他。早晨刚上班不久，林在走廊尽头楼梯过了几趟，他办公桌面对走廊，注意到林在向他示意，便从办公室出来，跟随林到走廊尽头拐角，见没有人来，两人便站住。林急匆匆告诉他，快回家准备一下，机关的红卫兵马上出发，要搜查他同屋的老谭的东西。他连忙下楼，拚命骑车，汗流夹背赶了回去，把他的东西全堆到他床上和床边地下。又急忙翻了翻老谭书桌的抽屉，见到老谭解放前上大学时穿学生制服的一张旧照片，合影的一个同学帽子上都有国民党的十二角白日标志的帽徽。他捏在手里揉成个纸球，出去扔到院外街上公共厕所的深坑里，转身回到院里，机关的小汽车就到了。

四名他机关里的红卫兵进到屋里，林也在其中。林知道他写作，却没有看过他的稿子，恋的是他，对他写的什么并不在意。她当然并非为他的稿子而来，放心不下的是他拍了她不少照片，并非怎样裸露，却也相当惹眼，是他们在西郊八大处树林里野合前后拍的，只要拿到一张，一眼就可断定两人早越过了同事乃至革命同志的关系。林是位副部长的小女儿，已婚，丈夫是军人，也老革命家庭出身，在军队的一个研究所工作，研制的不外乎火箭或什么新式武器。他对国防机密毫无兴趣，迷恋的是这位丽人，林比他还更主动，也更火热。

林故意显得十分轻松，大声嚷嚷：“你这房里好小呀！也没个地方可以坐的。”

她分明来过，当然是趁老谭不在的时候，那时穿的连衣裙，领口开得很低，背上的拉链一扯，便可撩开亲到她的奶，不像这会儿改穿一身军装，松松一股的大长辫子也剪成了两把刷子，用橡皮筋扎着，部队女兵标准的发式，也是现今红卫兵的款式。“你弄点茶呀，喝死啦！”

林还故意敞开房门，站在门槛上掏个小手帕直扇，显然要让院里在窗后张望的邻居明白，他们来查抄的并非是他，把这番查抄也弄成像串门一样热闹。

他赶紧给大家泡茶。那几位都说不用，不用，可已经败坏了这场清查具有的森严的气氛。

再说，平时大家都认识，没带红袖章之前看不出家庭出身的界线，彼此彼此，似乎是平等的。红卫兵的头儿大年，一个胖敦敦的嘎小子，平时午间同他一起打乒乓球，他们混得还熟。大年的父亲是部队师政委，戴的是他老子的旧军帽，洗得浅黄发白，扎的也是现役军人都不要用的旧皮带，更显出血统的革命接班人气派。

红卫兵刚成立的时候，他和一些非“红五类”出生的青年也应邀列席会议。这大年崭露头角，骑坐在长桌的一端，对没资格入红卫兵的青年们说，“今天来列席我们红卫兵会议的都算是咱们革命队伍的同路人！”还指名道姓冲他说，“你当然也是！”以示不外。可他读过《联共党史》，知道“同路人”到头来意味什么。这突然袭击要不是林通风报信，查到他这些稿子的话，他可不就毁在这小子手里了。

大年一时还没拉下脸，只是说“我们来查抄谭信仁的反动罪证，同你没关系，哪些是你的东西？都分分开。”

他也做出笑脸，说“东西都分开了，还有什么要帮忙？”

他们也就都说：“没你的事，没你的事，哪是他的书桌？”

“那张，抽屉都没上锁。”

他指点给他们，站到一边，这话算是他对同屋老谭能做的唯一的辩护，同时也就划开了界线。他事后才知道，就在他下楼骑车往这里赶的时候，机关大楼的前厅里贴出了红卫兵的通令：“揪出历史反革命分子谭信仁！”老谭就此隔离在机关大楼里，失去了人身自由。

他们翻出了谭的笔记本、译稿、信件、照片和英文书籍。谭业余翻译点英文小说，也都是亚非作家颇为革命的作品。可有本英文小说封面是个半裸的洋女人，这书便也搁到一边。抽屉垫底的旧报纸下，还翻出个白信封，打开竟然有几只避孕套。

“这老东西还干这档子事！”

大年拎出一支，晃了晃，大家都笑了。

不是当事人乐得轻松，人人都显示出清白无辜，他和林也都笑了，但避免目光相遇。

后来在批斗老谭的群众会上，追查有“不正当两性关系”的这女人，怀疑是特务网络，谭不得不交代出这个寡妇，当即便通知这个女人工作单位的红卫兵，也抄了家。谭的抽屉里一些感伤的旧体诗词，也许是写给那女人的，都成了“怀念失去的天堂，反党反社会主义”的铁证。

红卫兵们见屋内砖地上有两块松动的砖，撬了起来。

“要不要找邻居借把铁锹？”

他故意问大年，免得也处于受查抄的难堪境地，同时也想恶作剧一下，不如挖地三尺作考古发掘，恐惧来自事情发生之后。他去隔壁退休的老工人屋里借来把铁镐，他们还真挖起来，弄得满屋泥土和碎砖没有处下脚，镐便扔下了，没人再动手。

他后来才知道，机关的保卫处得到街道居民委员会的报告，说这屋里有无线电发报机声响，报告的想必就是隔壁邻居那位姓黄的老工人。他和谭上班去了，这退休在家的老头听见上锁的房门里忘关了的收音机里的声音，想当然以为在秘密发电报，要能抓出个敌人，便足以证明对领袖和党的一片忠心。查抄之后，他在院子里同这老家伙照面，那老脸上的皱纹依

然堆满笑容。灾难就这样从他身边擦过。

红卫兵们走了，他望着一屋子挖开的砖块和泥土，心想到等灾难也这样落到自己头上就晚了，这才下决心，把那些稿子和日记付之一炬，终于埋葬了他的诗情，童年的记忆，青少年的自恋、幻想和当作家的梦。